

## 焦點評析

# 十八大前的中共菁英衝突問題

---

## Elite Conflicts before the 18th CCP National Congress

張執中 *Chih-Chung Chang*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Public Affairs and Management  
Kainan University*

去年(2011)10月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召開黨的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決定今年下半年在北京召開。在此之前，中共也按鄉縣市省的順序進行四級黨委換屆，為「十八大」做組織準備。在今年上半年，也進入省委黨委換屆階段。不過，外界更關注的，主要在於「十八大」正值十年一次的最高領導班子世代交替。在「幹部年輕化」與「梯隊接班」的規劃下，年齡與任期限制是中共進行黨政精英新陳代謝的重要機制。其中，高層領導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常委)68歲劃線退休的機制大體確立。若依「七上八下」原則，1944年以前出生者，屆時都將退休。因此在政治局25位委員中，將有14人退下，當中包含7位政治局常委。

「十八大」領導層過半的代謝率，成為新一代菁英競逐的目標。舉例而言，如薄熙來與汪洋之間，從「唱紅打黑」對上「幸福指數」，到「重慶模式」對上「廣東模式」，這兩種不同的論述近年來在大陸輿論界與政壇發酵，對外所顯示的不僅在人事競爭，其背後的派系關係、路線差異以

及不同社會力量的支持，考驗「十八大」後新領導人的整合能力。另一方面，從今年2月王立軍事件爆發，到3月中共中央發佈免去薄的市委書記職務，4月停止其中央委員與政治局委員職務，正好提供外界一窺金字塔尖的權力運作以及中共菁英政治的問題所在。王、薄等省級領導人之位階，其所涉及的貪腐與刑案，以及任內操弄權力及壓制人權，與任內的「唱紅打黑」形象形成強烈對比；而薄的下台除牽動「十八大」人事布局，也影響前述各種勢力的消長，如太子黨、新左派、政法系統等，同時也影響改革的動力，突顯出中共黨政系統與政策的缺陷。

### 一、集體領導與核心

雖然「核心」的概念用以表達在集體領導中具有主導地位的個人角色，但是不同於毛、鄧的個人功績與特質（charisma）。若回顧鄧小平晚年竭盡所能強化「江核心」的地位，使江澤民成為黨、政、軍最高權力中心，並且透過黨的會議強調維護、服從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領導權威，這種固權的設計，反而說明了後強人時期中共權力結構所可能面臨的不穩定。這當中所面臨的困境在於，當政策（如經改）無法達到預期成效，或者重大事件（如王、薄案）必須即時回應時，領導人將陷於一個充滿對手的環境。因此核心與集體的互動關係，成為鄧後時期中共政權運作的重心所在。而核心權力的鞏固，除了不同政治勢力間的權力平衡，還必須顧及軍隊的支持、培植權力網絡與個人路線的建立。

在權力接班的過程中，領導人擔心接班人背離路線並反蝕；而接班人必須小心翼翼如實習生般，避免威脅領導人權威。這也是為何習近平論「黨建」、談「文風」，偶而強調或者迴避哪些口號或套話，常引起外界矚目的原因。此外，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接班制度化仍不足，「十六大」江澤民「交班不交槍」，繼續掌握軍權至「四中」全會。而胡錦濤在「十八大」是否全退？或延續「江模式」？外界也仍未有定論。當新一代領導集體與上一代核心「共存」，也讓世代交替的步伐被迫延緩，延續派系利

益的矛盾。

由於黨的領導人作為制度之上的最高權威人格，而且在強調集體領導的同時，仍高度強調領導核心的重要性，其他政治菁英的個人色彩自然也就不能超越此原則。在胡溫時期，隨著社會治理的需求與網路媒體影響力擴大，高層菁英除了傳統上熟悉黨政運作，以及學有專長的技術官僚外，也越來越注重自我行銷。多數地方領導逐步推廣自身的發展經驗，並強化與社會的聯繫，尋求多重正當性來源。以重慶為例，薄熙來「先分蛋糕」的論述，十分籠絡人心。就如溫家寶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收入分配問題突出，廉政建設亟需加強。<sup>1</sup>因此對民眾而言，印證了鄧小平「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論點，「重慶模式」與「唱紅打黑」，幫民眾解決當前權貴資本主義與貧富差距，相對也樹立薄熙來的個人形象。就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撰文稱，中共內部出現了一個以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為首的新毛派陣營。<sup>2</sup>只是這一角色是否符合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路線，在行動上是否與中央保持一致性，從溫家寶在人大記者會中，要求重慶市委記取教訓，並強調黨的基本路線，應可看出端倪。

薄、王事件後，中共中央強調「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要求全黨全軍要保持與黨中央的一致，以及思想認識的統一，也說明中央在處理薄案的敏感性。一方面，中央決定以同為太子黨的張德江主掌重慶，維繫派系平衡之動機；另一方面，中央對外必須顯示「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團結，讓薄王事件定位在獨立的刑事法律案件，而非黨內鬥爭或路線衝突。但事實上，近來在大陸興起的「紅歌」現象，起因來自社會失衡與濫權貪腐的不滿，也讓政治人物與社會力量有相互支持的空間。雖然中央提出「正本清源」，鞏固思想陣地。但包括「零八憲章」或

---

<sup>1</sup>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2012 年政府工作報告(實錄)全文〉，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2-03/05/content\\_24808051.htm](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2-03/05/content_24808051.htm)。

<sup>2</sup> 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中國：用歷史塑造未來〉，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9680>。

者「新左派」，透過網路平台串連各界支持者，無非是希望在未來的改革路線規劃上獲得話語權，而國家與黨內思想的分化，也意味新領導人推動改革的不確定性和菁英衝突的可能性上升。

## 二、黨內民主與權力監督

從「十七大」至今的發展可看出集體領導原則、票決制、基層幹部直選與幹部制度改革，成為「十七大」之後中共黨內民主的主要方向。而「四中」全會提出「逐步擴大基層黨組織領導班子直接選舉範圍」，可視為對書記競爭上崗、公推直選、兩票制等選舉模式的認可，並有機會並朝縣級發展。最終形成任期、選舉、任命、競聘等黨政幹部任免規範，除擴大群眾參與空間，也引入有限的競爭、迴避與問責機制。

不過，組織寡頭特性，中共依「黨管幹部」與多層次間接選舉，組織層級越高，自主性也越高，影響的變項在於前述資歷與派系平衡上；反之，基層組織則更有賴於群眾與黨員的支持。依此觀察中共對黨內民主的所設定的邊界，從高層到基層採取不同的制度修正，並將改革重心置於基層政權，以符合中央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步調，也因此形成「分層管理體系」。另一問題是，基於下管一級原則，用何種方法任命下一級幹部，由各級自主決定。因此主要的爭議是落在上級對下級「一把手」的干預。比如在省委委員中，不僅在換屆前夕對幹部特別是書記、副書記大量調動和委派，而且也在換屆之後不久和任期內也經常調動和委派。總的來看，當前中共是在任命制的框架下進行黨內民主改革，把一些屬於選舉制的要素納入任命制的框架內，兩種制度的衝突就隨處可見，也難改變各系統「一把手」權力壟斷，以及對其權力監督的問題。

媒體對於薄、王事件的報導，時常拿前上海書記陳良宇案相對照，也顯示長期來中央對地方的監督一直存在盲點，但是問題的關鍵仍在於權力集中。薄熙來藉王立軍之手「打黑」，主要依恃對政法系統的掌控。而當前在「維穩」大旗下，地方政法、公安部門地位的提升，也更強化這樣的

態勢。另一方面，同陳良宇案相同，中央透過紀委對薄、王「雙規」，官方報導一如既往的簡潔，僅提到副總理張德江接替薄熙來兼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王被革職的理由是中央反腐敗，但也讓官員們明白了「跟人要跟準」的道理。未來無論是削弱或強化政法與紀檢系統，權力鐘擺仍指向黨組織，本質還是政治鬥爭而非強化法治。

### 三、結語

薄熙來案雖然擾亂中共「十八大」的權力佈局，但是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原則下，派系間的妥協實現權力平穩過渡，應是高層的共識，因此薄案最終只在於個人權位的變動。對中共而言，集體領導制度是鞏固具有高度人格化的領導核心之手段。只是相較於江澤民與胡錦濤，第五代接班人的歷練時間相對較短，未來除了要應付上一代核心勢力的延續，也面臨來自同僚的更多挑戰，必須更仰賴集體領導。因此在內部思想分化與派系平衡的考量下，新領導人上台後如何在政治改革上凸顯創新與願景，仍具有許多不確定性。但可預測的是，權貴資本主義是左派結合社會支持的重要依據，也是衡量中共法治建設成效的指標，幹部年輕化政策與腐敗年輕化趨勢的結合，將成為新一代菁英發展的隱憂。

